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档案事业

胡金凤

(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史志办公室,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要: 南北朝时期是档案事业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 重建各项秩序的同时对档案也极为重视, 以档案为依据重塑政治和巩固政治地位。档案在政治、婚姻、差役赋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南北朝; 谱牒档案; 谱学; 士族; 庶族; 档案载体

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特点

公元220年, 从曹丕取代汉朝建立魏国开始, 即进入三国时期; 后来,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 建立西晋, 以后为东晋、十六国; 南北朝各成系统。早在东汉末年, 社会就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正如《诗经·大雅·荡》中描述: “如蝮如螭, 如沸如羹” 即人们的悲叹之声犹如夏日的蝉鸣一样不绝于耳、又如煮沸的羹粥久久不息, 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这一时期,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豪门士族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 频繁的政权更替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战争同样对档案典籍造成了极大破坏, 政权的不断更替, 对档案事业的发展成为严重阻碍。从东汉末年, 到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乱”, 使南朝都城建康几成废墟, 梁朝的档案更是在劫难逃, 就连南朝皇帝梁武帝也是参与焚毁档案的元凶。战火蔓延之处, 密阁中所藏经籍不是焚毁就是散失。《隋书·经籍一》中所载: “惠、怀之乱, 京华荡覆, 渠阁文籍, 靡有孑遗”。说的就是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十六年之久, 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 同时也使当时的都城屡次遭到洗劫, 收藏在石渠阁的档案书籍遭到严重损坏, 没有遗留。简言之, 社会动荡、档案流散。

另一方面, 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 统治阶级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 知道档案典籍的重要性, 对档案典籍的收集、保管极为重视。所以, 统治阶级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保障。北朝初期, 因为是少数民族政权, 统治者在强制汉化的同时在文化思想上吸收汉文化的因素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因此也十分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梁朝建立侯, 梁武帝萧衍十分重视史籍档案的收集, 还辟让出文德殿专门存放收集来的史籍档案。南朝梁元帝在位仅三年时间, 也收集各种档案典籍竟有六万七千卷之多。

从管理模式上看, 这一时期档案管理基本沿袭汉制, 如设立有尚书、中书、秘书等处所, 有秘书郎、著作郎、主书、令史等职位, 他们负责对所藏档案的日常保管和编撰。此外, 档案还存放在宗庙、东观、秘府。公元222年, 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写道: “其以此诏藏之宗庙, 副在尚书、中书、秘书三府”。皇帝的诏书也是档案的一种, 沿袭秦汉时期的名称, 即皇帝的下达的命令分为诏书、制书、册书、戒敕四种, 正本皆收藏于宗庙。为便于颁布施政, 副本在三省, 即尚书、中书、秘书。由于受门阀制度的影响, 士族一味地追求高官厚禄而不屑做琐碎低下的文秘职务, 因而出身低微的寒门文人, 逐渐管理档案典籍, 成为专门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 为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成为可能, 同时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二、谱牒档案的产生和发展

曹魏时期, 曹操曾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到曹丕执政后, 又制定九品中正之法。“魏氏立九品, 置中正, 尊世胄, 卑寒士, 权归右姓也”。将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的实行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以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后来在实施的过程中,

道德和才能被弱化,

出身门第越来越受到重视, 甚至出现了世家高门和寒门庶族的严格界限, 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豪门士族为了彰显门第维护和巩固特权, 对谱牒的编修都十分重视, 世家大族都编有自己的家谱或族谱。

“谱牒, 是以家族发展为背景、记录氏族世系发展的图册, 起源于夏朝, 盛行于魏晋南北朝。”(1)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经提道: “维三代尚矣, 年纪不可考, 盖取之谱牒旧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 对出身门第的重视达到高峰进而成为一种门阀制度。参加选官, 必须考察谱牒。在当时的豪强士族社会, 为了适应门阀士族政治的需要, 谱牒大大发展了。谱牒档案的作用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一) 做官的凭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 朝廷的高官显位非得是士族高门独有, 寒门庶族只能担任卑官末职, 所以, 在选拔官吏前, 先要查验是否出身士族, 等第如何, 谱牒就是重要依据。用谱牒辨姓氏贵族、别门第高低。形成“考之簿世然后授任”“有司选举必稽谱籍”的局面。梁元帝所著《金楼子·戒子篇》中所记: “谱牒所以别贵贱, 明是非, 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 或复通塞升降, 百世衣冠, 不可不悉。”就是说明了谱牒的作用就是辨别出身门第。

既然出身门第是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 那么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吏如吏部尚书、吏部郎以及州郡等地的官吏, 就必须对所辖范围内的士族情况详细了解, 这也是成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否则很容易混淆士族和庶族而犯下错误。所以, 当时的吏部尚书和吏部郎等官员, 不是谄谄属下的士族就是熟悉谱牒姓氏。形成“高门华阀, 有世及之荣; 庶姓寒人, 无寸进之路”(2) 的局面。当时的高门士族羞于与寒门为伍, “服冕之家, 流品之人, 视寒素之子, 轻若仆隶, 易如草芥, 曾不以为伍”。(3) 由于严格的门第之分, 阻断了寒门士子晋升之路, 从而出现伪诈高门、贿赂编修谱牒者的趋利者, 从而“谱牒讹误, 诈伪多端, 人物雅俗, 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 即成冠族; 妄修边幅, 便为雅士”。(4) 为了便于鉴士庶、别门第, 防止假冒士族, 梁武帝接受沈约的进谏要求, 查阅旧有的谱牒重新编修谱牒, “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 (5) 此时吏部尚书是齐王俭。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 参掌大选, 究识流品, 谄悉人物, 拔才举能, 咸得其分”刘湛“为选曹, 撰百家谱, 以助铨叙”; 陈姚察任吏部尚书, “尤喜人物, 至于姓氏所起, 枝叶所分, 官职姻娶, 兴衰高下, 举而论之, 无所遗失”; 梁傅昭亦曾“参选事”, “博极古今, 尤善人物, 魏晋以来, 官宦簿伐, 姻通内外, 举而论之, 无所遗失” 精通家谱; 陈孔免任吏部尚书, “鉴识人物, 祥练百氏, 凡所甄拔, 衣冠缙绅, 莫不悦服”。可见在当时精通谱牒是成为担任选官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不熟悉士族谱系, 贵为皇室且“清干有余”, 也难胜任吏部官职。

北朝的情况与南朝相差无几, 北魏孝文帝为巩固政权, 同样

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做为官吏的首选标准。对此,周一良先生认为“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和族谱”(6)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家谱,但是具有谱牒的实用性质,在选官任事中,发挥了具有和南朝谱牒一样的作用,

(二) 婚姻的参考

在门阀制度下,社会被严格区分为士族和庶族、上层士族和下层士族、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这些不同的集团,形成严格的壁垒,在婚姻缔结方面为保持特权利益,严格在内部实现姻亲的缔结,绝不与不同阶层、特别是上下层级之间通婚。如果违反这一规则,混乱了血统,就难以在特权阶层立足而遭到弹劾。北方士族南迁后出现公侯子孙,失其本系,“凡在一地方为人所尊敬者,易一地焉则人莫之知”。有些下级士族或庶族,为改变阶层或提升身份门第,会想尽办法与士族攀亲通婚。为了有效防止婚姻关系的混乱影响士族权贵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查阅谱牒,谱牒成为身份认证的重要参考依据。恩格斯说过,“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志。”(7)阶层之间、特别是豪门士族之间的联姻,已经渗透进政治因素而成为利益集团。如高门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可后来“索璋之籍阅”查核,竟然“士庶莫辨,”即搞不清家世出身了。为此,沈约还上奏弹劾王源,建议“免所居官,禁锢终身。”(8)以结婚为纽带,加以政治因素结成联盟,用以巩固特权阶层的利益。如琅琊王羲之娶高平郗氏之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娶陈郡谢安侄女谢道韞王导之孙王珣娶陈郡谢万之女,王珣弟王琨娶谢安之女等,(9)而谢家和王家在当时都是权倾朝野的豪门望族,两家的联姻,也是政治上联姻,特权更加巩固。

(三) 避家讳之用

所谓家讳,也称私讳,即父母、祖父母之名。避讳很早就有,秦始皇时期就开始。魏晋时期,家海之风盛极一时,凡是士族贵族的祖先名讳,要避免在其子孙面前直接说出,要用其他方式代替,否则会被视作无礼。为了避免出现笑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谄熟谱牒。南朝是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10)就是充分显示了普学家的学识。陈朝孔奂“封赏选叙,纷纭重叠,奂应接引进,门无停宾。加以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11)只有游刃有余的用好谱牒,避免触犯对方的名讳,才能游走官场。由此可见当时谱牒的应用之广泛。

(四) 征发差役的依据

在南朝,谱牒除了成为选官之用和姻亲、避讳等外,还是政府征发徭役的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贵族并不在服徭役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士族贵族倾尽全力维护阶层的根本所在。而庶族阶层为了逃避差役,也会想尽办法在谱牒上做文章,如贿赂谱牒编者冒充士族。如荒伧人王泰宝就从当时的第一普学家贾渊那里买到了最为高贵的“琅邪谱”,以致贾渊差一点被政府处死。南齐时期庶族“改注籍状,诈入仕流,”以逃避差役的情况十分严重。到梁武帝时期,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的征发。为此,梁武帝除了接受沈约建议重修百家谱意外,还设立了专门保管谱牒的机构——谱局,以及专门管理谱局的官吏——令史。北魏南迁后,孝文帝也组织人员为迁入中原的拓跋贵族订制族姓、建立谱牒。可见北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门第出身,亦有类似南朝谱局一样的机构。南朝从东晋始就出现官修谱牒。

所以,从东晋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由政府组织编修谱牒。如贾

弼之编修谱书时,官府就曾经给其令书史,协助修书。虽然没有成为制度化,但有明显的官修性质。随着时代的发展,谱牒的编修已经从私人修撰逐渐向政府编修过渡,成为这一时期史籍档案的重要特征。

三、档案载体材料的演变

我国古代档案载体材料,自殷商甲骨起,经历了青铜、石头、竹简、缣帛、纸质等不同载体的演变。载体材料由重变轻、由繁至简、由不易提携、使用、保存到随身携带,便于使用,由材料花费昂贵到低廉的变化。

在纸张没有成为书写工具之前,人们一般是在简牍和缣帛上书写。简牍就是竹简和木牍的简称,经过加工成为书写工具,不仅字数容量小、还体积大不便携带。而缣帛是属于丝绸的一种,由于材质昂贵成为不了普遍的书写工具。据考古发掘,最早的纸张是出现在西汉,但是这种纸非常粗糙不便书写,不适合当作书写工具。直到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前人的造纸技术,从材料来源(低廉)以及纸张的质量(细腻光滑)都得到极大的改进,为纸的推广使用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很好的书写材料。到魏晋时期,随着大量优质廉价的纸张用于书写,为取代简牍提供了条件。东晋末年,豪门权臣桓玄掌握朝廷大权后,下令停止使用简牍书写公文。据《太平御览·桓玄伪事》:“古无纸、故用简……令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2)至此,简牍完成了历史使命,纸张成为重要书写材料。随着的造纸技术的不断改进,纸张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工匠们开始把防虫技术运用到纸张的制造,出现了染过的黄色防虫纸。在一些重要的公文书写时,用防虫黄纸书写。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背景下,史籍档案呈现特有的时代特点,纸张的改进以及成为书写主要材料后,又促进了笔墨纸砚的发展以及书写领域里的艺术化。篆书、隶书发展到魏晋时期的楷书,进而向草书变化。以这些为基础的档案史籍数量又大大增加。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参考文献:

- [1] 庞铭辉,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档案兴盛的原因[J] 山东档案, 2009(2) 60-62
- [2] [清] 赵翼, 廿二史札记·九品中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2
- [3] [宋] 李昉等编, 文苑英华·卷七六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987
- [4] [唐] 姚思廉, 梁书·武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唐] 杜佑, 通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22
- [6]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7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4
- [8] [唐] 萧统编, 李善等注, 六臣注文选·奏弹王源[M], 中华书局, 1987: 746
- [9] [唐] 房玄龄等撰, 晋书·谢安传子琰附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078
- [10] [唐] 李延寿撰, 南史·王僧孺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462
- [11] [唐] 姚思廉, 陈书·孔奂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286
- [12] 注引《桓玄伪事》, p57(唐)徐坚, 初学记·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